



何兆武
思想文化随笔

从身份 到 契约

何兆武谈哲学 // 何兆武 著

迄今为止，
一切进步性社会的运动，
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学林出版社

 何兆武
思想文化随笔

从身份到契约

何兆武谈哲学

何兆武 /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身份到契约：何兆武谈哲学 / 何兆武著 .

—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9.10

ISBN 978-7-5486-1586-6

I. ①从… II. ①何…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50998 号

策划人 钟秀斌 周青丰

责任编辑 王莹兮

特约编辑 夏青

封面设计 微言视觉 | 苗庆东

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

从身份到契约：何兆武谈哲学

何兆武 著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46千字

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86-1586-6 / B·61

定 价 48.00元

何兆武

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历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有《社会契约论》《思想录》《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历史理性的重建》《中西文化交流史论》《西方哲学精神》《苇草集》等，另有口述著作《上学记》。

自述*

我原籍湖南岳阳，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9月全家间道南返故乡，在长沙中央大学附属中学（由南京迁校）；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研究生。

毕业后，按时间顺序，我基本的简历如下：1946年至1949年任中国台湾“建国中学”、湖南第十一中学教师；1949年至1950年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毕业；1950年至1952年任北京图书馆编目员；1952年至1956年任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 本文原载《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收入本书，编者略有修改。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

在学术交流方面，1980年任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中方访问美国学者；1984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鲁斯基金访问教授；1986年至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93年至1995年任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我自己幼儿时正值军阀混战，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和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印象至今难忘。其后做小学生时又值“北伐”和“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无日不在危城之中。上中学时，全民抗日战争爆发，随后是不断的颠沛流离。上大学时是“欧战”，继而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读研究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许是由于自幼在古老的北京城里生活所培育的思古之幽情和连年战乱所引发的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感触和思索，使我选择了历史作为专业。

求学时期许多师友的启发，以及虽在战时却仍然相当丰富的图书与便利的阅读条件，容许我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难忘的时光。在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之时，却往往能得到精神上无比的启蒙之乐。

当时的校园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它给了学生们很

大的自由度，可以自由转系、自由旁听，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同学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自己曾前后转过四个系，曾旁听过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和“文学与人生”，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和“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刘文典先生的“温李诗”，冯至先生的“浮士德”，汤用彤先生的“大陆理性主义”和其他的课程和讲演。这些都不是我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同学好友中王浩和郑林生都曾对我的思想有过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专业我虽然一窍不通，但他们的谈话和思路每每给我以极大的启发。在专业上，噶邦福老师（J.J.Gapanovitch）则是引导我对历史哲学感兴趣的指路人。

新中国成立后，自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了侯外庐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班子，作为他的助手工作了30年。

我认为侯先生的最大优点和特点是决不把思想史讲成是思想本身独立的历史，即不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把思想首先当成是现实生活的产物，然后才是它从前人的思想储备库中汲取某些资料、方法和智慧。这本来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之所在，即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然而20世纪60年代所风行的

观点却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强调思想领先，把事情说成是思想在决定一切存在，历史是沿着思想所开辟的航道前进的。当时各种运动、劳动、社会活动和不务正业的各种业务接连不断，几乎占去了一个人绝大部分的时间，自己的专业也就无从谈起。

因为对西方思想史也感兴趣，所以不时也偷暇翻阅一些，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自留地”或是“地下工厂”的。偶然得到了哈布瓦赫（Halbwachs）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注释本。卢梭的书已是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大有影响，而居然没有一个可读的中译本，更不用说注释本。于是我又找来几种名家的注释本和沃恩（Vaughan）的权威本，除了翻译本文之外，还做了些集注的工作，多年来已前后修订过三次。

近代西方思想史，我以为实际上是两大主潮的互相颞颥：一条是由笛卡尔所开辟的“以脑思维”的路线；另一条是由帕斯卡所开辟的“以心思维”的路线。后一条路线并不违反科学，帕斯卡本人就是近代最杰出的数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

我恰好有一本布伦茨威格（Brunschvicg）的帕斯卡权威本，所以就译了他的《思想录》，并找了几种注释本，也做了一点集注和诠释的工作。在我感兴趣的历

史哲学领域，我以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一书，迄今仍不失为西方最深刻、最有价值的著作，所以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把它译了出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时间较多，研究环境也较前宽松，几次出国，也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未能见到的书和材料，于是又动手翻译了几部书，也写了一些文章。文章大多已收入自己的书中和文集中。

近代中国较近代西方落后了一步，所以 19 世纪、20 世纪的中国还在补西方 18 世纪、19 世纪的课。把历史学认同于科学，就是在思想上补 19 世纪实证主义的课。

我以为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所以它必须服从科学而不能违反科学），又有非科学的一面（所以就不能以实验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要求为历史学之能事）。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学（和人文学科）还另有其自己独特的纪律、规范和准绳（Criterion）。我希望有人能把它写出来，我自己也愿意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活动，所以研究人性运动的轨迹（即历史）就是历史学的当然任务。人性当然包括阶级性在内，但阶级性并不能穷尽人性。善意固然是

人性，恶意也是人性。“文革”对于其他专业工作者未免是一种损失，使他们失去了大量宝贵的钻研时间。但是唯独对于文科来说（如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它却也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和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的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的中国史、世界史以及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

目 录

- 001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
- 021 从身份到契约
——梅因《古代法》读后感
- 038 激进与保守 革命与改良
——读柏克《法国革命论》
- 046 帕斯卡与《思想录》
- 075 “普遍的历史观念”是怎样成为可能的
——重评康德的历史哲学
- 107 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
- 117 一条通向康德体系的新路
——读《论优美感与崇高感》
- 138 重读康德
- 149 关于康德的第四批判

162	康德也懂历史吗?
180	盖伦和他的《科技时代的心灵》
187	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评序
191	论王国维的哲学思想
249	历史与理论
257	编 后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

◇ 人类本来是自由的，是平等的，人类订立契约的前提也是要保障人民作为主人的自由和平等。假如一个政权违反了这一点的话，人民有权废黜这个政权，推翻政府，这一点奠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

◇ 野蛮人也可以是高贵的，并不一定只有文明人才是高贵的；自然状态是美好的，并不一定只有文明的生活才是美好的，文明社会也充满了虚伪和狡诈，但是野蛮人的生活里没有这些东西，它是自然的，是淳朴的，所以卢梭提出一个口号：“返于自然。”

◇ 近代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近代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逆转的。

《论科学与艺术》是18世纪中叶法国著名启蒙思想

* 本文是2000年3月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

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卢梭写的一本薄书，这其实是一篇文章，他从三个方面涉及近代化的一个根本问题，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的道德并没有好处，并不是说科学技术进步了，人类的道德就更高尚更纯洁了。文章中的一些结论大概是不对的，但是他提出的一些问题非常有价值，就是近代科学的进步怎么样才能够配合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卢梭所处的时代

卢梭生于1712年，1778年去世。他所生活的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纪。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人类在地球表面上出现至少有几百万年，但是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仅仅只有5000年左右。这5000年的文明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叫作传统的文明史，就是从5000年以前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到500年前，即公元1500年左右。这段历史的特点是农业文明。我们知道，有了农业才可以定居，有了定居才可能有文明。农业社

会是简单的再生产，所以可以设想古代的农民生活大概几百年也不会有显著的变化（假使天下太平）。

最近 500 年的历史从根本上有了不同，最显著的不同表现在物质上。这 500 年的文明可以说是一个近代化的过程。近代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化的过程。近代化和现代化，在英文里是一个词：**modernization**。它跟古代传统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物质上，它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文明社会。科学技术是不断进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年年不同，甚至天天不同。这种变化速度是以前的文明无法比拟的，因为它的生产是扩大再生产。随着物质生活的扩大再生产，人类的思想、文化、精神面貌，相应地也要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能用古代几千年不变的那一套文化或者思想，或者社会生活，或者风俗习惯，来适应今天的社会——按照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上层建筑总要适合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已经改变了，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当然也在不断随之改变。

人类有很多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它的文明，但不是所有文明的发展都是同步的。每个民族的文明都是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的时候才开始的。可是一旦开始，众多文明的进步却各不相同，其中第一个迈入近代化的是西方社会。有几件大事可以作为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第一件大事，就是地理大发现。1492 年哥伦布

发现了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发现了印度洋航路；1519—1521年，麦哲伦第一次环球航行，从此形成了真正的全球历史。过去各民族的历史基本上都是独立的，每个民族都在发展它自己的文明。比如说，中国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不能说绝对没有接触，但是接触非常少，相互间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可是，今天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地点发生什么事，都会马上影响到另外一个地点。所以今天的世界越来越一体化，这应该说是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15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它标志着人类的精神从中世纪走入了近代。传统社会是一个守旧的社会，它的生活基本上是年年重复的，所以它的思想必然倾向于守旧，也是年年重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信仰主义者。但是近代的社会是日新月异的，近代的思想也是不断地翻新、不断地创新的。近代化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在思想上要突破传统主义。西方旧的传统是什么？就是基督教的信仰。马丁·路德的改革虽然不可能彻底——他并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并不否定耶稣基督的存在，但是他否定了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他否定宗教的权威，否定信仰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思想上的大解放。

第三件大事，是14世纪出现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开始时本来是学术思想的运动，但是后来就变成了不仅是个学术思想的运动，还是一个文化思想上的运动。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以复古求解放。复古运动是指恢复希腊古代的文明。古希腊文明跟中世纪基督教的文明有显著的不同。第一，古希腊文明重视自然科学，而中世纪是信仰的时代，鄙薄自然科学。第二，古希腊文明是非常重视现实生活的，而宗教社会鄙薄现实生活，认为现实生活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近代科学的出现。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传统的科学，但是那个科学和我们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科学是不同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近代科学和古代科学有所不同，古代的科学是猜测的、偶发的、天才的直觉。而近代科学则是有系统、有步骤、有方法、有目的地去追求一个真理。古代的科学结果和近代的科学结果也不一样，近代的科学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进步，可是古代的科学偶尔有了发现以后，又中断了。

举个最鲜明的例子，比如说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也是科学家——古代哲学就是科学，科学就是哲学——叫作阿瑞斯塔科斯，就提出来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那是很早很早的时候。中世纪时，人们的认识是地心说，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就把那个